

《奥鲁诺克》：第一部英国旅行小说的文化意义

张德明

(浙江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17世纪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奥鲁诺克》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旅行小说, 作家以欧洲的罗曼司和民族志为叙事模式, 创造出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文学形象。小说涉及的一系列前瞻性问题的, 诸如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帝国地理空间的扩张、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交往, 以及文明/野蛮、主人/奴隶、自我/他者、“新异”美学的建构等, 在我们这个跨文化交往时代里, 有着持续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英国旅行小说; 阿芙拉·贝恩; 《奥鲁诺克》;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2-0013-07

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资本、商品、信息和人口的全球性流动, 作为社会实践的旅行(travel)和作为文化表述的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 or travel writing)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 对旅行文学的研究无论在质和量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许多以往被忽略的旅行文学文本被重新发掘和整理出版, 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近年来, 有不少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17世纪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 认为她写的《奥鲁诺克, 或王奴: 一段信史》(*Oronoko: or the Royal Slave, A True History*, 1688), “包含了许多新异的要素: 漫谈式的风格; 女性叙述者的权威; 发生在新大陆的故事; 英属殖民地苏里南的奴隶起义……”等,^[1]此书“无论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研究、小说的兴起、美洲或跨大西洋研究、奴隶叙事、甚至自传, ……似乎都是一个理想的文本”,^{[2](1)}可以纳入多种批评框架中对之进行解读。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 着重考察该小说(以下简称《奥鲁诺克》)涉及的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帝国地理空间的扩张、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交往, 以及文明/野蛮、自我/他者、“高贵的野蛮人”的建构等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空间诗学与叙事模式

作为英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由女性写作的旅行小说, 《奥鲁诺克》的前瞻性意义首先在于它涉及了与现代性展开相关的空间诗学, 即中心与边缘、宗主国与殖民地, 欧洲文化与非洲及美洲文化的相遇、交往和冲突。

按照鲍曼等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 空间既是一种“产物”, 又是一种“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的生产”出现的, 现代西方的主体性也是通过一种地理和空间的规划, 通过对其栖居于其中的环境的持续的分解和重组建构起来的。^{[3](137)}而空间概念又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帝国的叙事框架”紧密相关。从空间关系上来定义, 帝国就是一个跨越了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 将其势力扩展到母国之外的地理空间, 并对后者实行有效统治的一个或紧密或松散的政治实体。而“帝国的叙事框架”就是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文本中, 为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展开设置背景、提供意义和价值的时空综合体(topology)。当代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奥梯斯指出, “毫不夸张地说, 贝恩的叙述者必须在一个帝国的框架内才能讲述奥鲁诺克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没有帝国就没有小说”。^{[4](119)}

收稿日期: 2009-11-18

基金项目: 国家“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WW002)。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54-), 男, 浙江绍兴人,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贝恩有意将《奥鲁诺克》前半部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邻近欧洲的非洲小王国柯拉曼廷(Coramantien)。借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术语,这是一个处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5] (94-95)}

“阈限空间”既不同于主动输出文化能量的中心,也不同于被动接受强势文化的边缘,而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遇或相交的空间。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中,外来的文化与原生地的文化呈现一种犬牙交错、互相纠结的共生状态。

女作家告诉我们,柯拉曼廷虽不是欧洲的殖民地,却是欧洲奴隶贸易“最有利可图”的一个地区。“因为这个族群非常好战和勇敢;他们与邻近的其他王国总是处在敌对状态,他们有机会抓获大量俘虏,把这些战俘统统卖为奴隶”。^{[6] (137)}英国奴隶贩子来到这里从奴隶主手中买得战俘—奴隶后,再把他们转运到南美殖民地,卖给当地的白人种植园主。在此交易过程中,这个非洲小王国就成了一个介于中心与边缘、内层与外层、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阈限空间”,来自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观念逐渐渗透了生活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中的人们,尤其是上层的贵族阶级。正如艾伯特·J.里韦罗(A. J. Rivero)指出的,“几乎无可争辩的是,在描述柯拉曼廷的皇家宫廷时,贝恩赋与它法国罗曼司的礼仪和情调,这是将她对皇室的同情文本化的另一种方式”。^{[7] (443)}

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从小受到欧式教育的非洲王子奥鲁诺克与其祖父—国王宠爱的女子伊梦茵达之间发生了一场法国式的浪漫爱情,打破了原有的贵族身份等级制。事发后伊梦茵达被卖身为奴,而王子则英勇地击败了前来围剿他的国王的军队。不料,凯旋的王子却被一个白人“朋友”骗上了奴隶贸易船,与其他黑人一起被卖到了南美。这样,小说的后半部分,叙事空间就从“阈限空间”转到了边缘空间——英国在南美的殖民地苏里南。奥鲁诺克与被国王逐出宫廷、卖身为奴的伊梦茵达异地重逢,共享了一段短暂的甜蜜时光。之后,在得知女友怀孕后,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成为奴隶,他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亡到丛林中,杀死

了怀孕的女友,自己也自残致伤,结果被殖民者抓获,肢解处死,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从上述情节不难看出,小说主人公的悲剧与空间的转换密切相关,而空间的转换又与帝国的势力紧密相连。因此,在上述两个显性的地理空间(非洲、南美)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地理空间,这就是欧洲。没有欧洲文化的介入,奥鲁诺克的爱情悲剧或许不会发生,或至多只是一个发生在非洲宫廷内的普通爱情故事,不可能具有跨文化的意义。正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贩卖活动的展开,才使得奥鲁诺克从一个非洲王国的王子沦落为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成为一个“王奴”。由于奥鲁诺克与前女友在苏里南的重逢,两人的爱情进入了帝国的叙事框架,成为涉及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冲突,主人公的身份危机等)的悲剧。也正是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才使得小说作者—叙述者有可能进入非洲和南美旅行,成为主人公悲剧的目击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

这样,当读者跟随叙述者穿越小说中呈现的不同时空场景时,也就体验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即“阈限空间”中的非洲宫廷文化和边缘空间中的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又都是通过欧洲的主导叙事模式(master narrative)呈现出来的,贝恩用法国的罗曼司模式叙述奥鲁诺克的爱情悲剧,用欧洲的民族志模式描述南美殖民地的土著生活,“借助奇异的和熟悉的融为一体的叙述,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和栩栩如生的描述,道德主题被纳入了奥鲁诺克的‘生活’中”。^{[6] (11)}

二、“阈限人物”与文化身份危机

无疑,小说的中心是黑人王奴奥鲁诺克。贝恩在致理查德·梅特兰勋爵(Richard, Lord Maitland)的献词中说,“我希望,我的文名足以使他的英名彪炳千秋”。^{[4] (119)}一个英国女作家为何要为一个非洲黑人王子写“信史”(a true history)?这就引起了当时的和后世的批评家的猜测。劳尔·梅茨格(Lore Metzger)在为《奥鲁诺克》现代版写的导言中认为,奥鲁诺克很可能实有其人,或许就是女作家游历南美时结识的一位非洲情人。通过写这部小说,她在追忆自己

失去的青春岁月和异族恋情。^{[6] (10)}笔者认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重要的不在于贝恩是否有过这么一位异性朋友或异族情人，而在于她为何能以其惊人的前瞻性，创造出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文学形象”，^{[6] (10)}并进而提出跨文化交往中的多重文化身份问题。

贝恩在塑造奥鲁诺克这个形象时，有意采用了罗曼司的叙事模式，突出了主人公对爱情和荣誉的执着追求，而这种追求又与他与生俱来的非洲贵族血统和他后天受的欧式教育密切相关。女作家告诉我们，这位非洲王子从小是在一位法国家庭教师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能流利地说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具备与白人殖民者进行跨语言-文化交流的能力。于是，他与其祖父宠爱的女人发生法国式的浪漫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此外，他在早年也参与过奴隶贩卖，将自己捕获的战俘卖给白人为奴。因此，在白人眼中，他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文明化的野蛮人”，而在因战败被捕而成为奴隶的黑人眼中，他又是他们的主子和战神。总之，奥鲁诺克无论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无论在非洲宫廷中，还是在南美殖民地，都显出他是一个既不同于白人殖民者，又有别于其他非洲黑奴和印第安土著的另类奴隶——“王奴”。他皮肤漆黑，但鼻子却高高隆起，“不是扁平的，非洲人式的”；他既具有高贵的血统，又始终保持着蛮野的活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他能独自深入虎穴徒手搏击虎仔，又能孤身潜入水下捕捉可怕的电鳗；他在南美殖民地捕杀了一头已经被当地土著神化或妖魔化的猛虎，当他剖开这头猛虎的胸膛时，发现它的肝脏中竟留有7粒欧洲人的铅弹。

贝恩在给小说定下标题“王奴”(the Royal Slave)的同时，也对主人公的身份作出了定位。在这个称呼中，既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矛盾，又有某种程度上的反讽。高贵的“王者”和卑贱的“奴隶”两个能指统一在同一个所指/肉身上，表征了种族界线和阶级界线的交混。“王”是由血统而来的高贵性，“奴”是因阶级而来的卑贱性；前者来自自然，后者来自社会和文化。由于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商业主义基础上的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昔日的高贵者(“王”)成了今日的

卑贱者(“奴”)，而昔日的卑贱者(欧洲的平民和刑事犯)则成了今日的高贵者(种植园主人)。对此，奥鲁诺克这个天生的高贵者自然是不服的。他在苏里南发动奴隶起义前作的一番演讲，义正辞严，充满了自由的激情和高贵的尊严，也透露了他发动起义的最深刻的个人动机：

难道他们是在战争中高傲地打败我们的吗？难道他们是在光荣的战斗中赢得我们的吗？……不，但我们像猿猴一样被买进卖出，成为女人、傻瓜和懦夫的玩物，成为那些因抢劫、谋杀、偷盗和恶行而抛弃自己国家的恶棍和亡命之徒的帮手……难道我们该服从这样一个堕落的种族，没有一丝人类道德使其高出于最下流的造物，你们愿意忍受来自这样的双手的鞭答吗？^{[6] (61)}

女作家借奥鲁诺克之口发表的对主-奴关系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她的政治态度。显然，在贝恩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主-奴关系应该是通过证明人的高贵性的战争建立起来的，而不应该是在卑劣的商业欺骗和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观点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有关主-奴关系的思想不谋而合。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主-奴关系的形成是两个相互对抗的欲望冲突的结果。每个欲望都谋求首先被对方承认。斗争的结果是，那个宁死以求对方承认的欲望得到了另一个不敢冒死以求的欲望的承认，人类社会主-奴关系由此形成。^{[8] (4)}

如果说“王奴”这个称呼背后更多体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存在的一种与阶级相关的身份危机，那么，“奥鲁诺克-凯撒”(Oroonoko-Caesar)这个称呼，则表征了这位黑人王子面临的另一个身份危机，文化身份危机。

奥鲁诺克在被卖到英属殖民地苏里南后，他的种植园主人给他起了一个纯欧化的名字——“凯撒”，这里，他的非洲“本名”和欧化的“叫名”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和矛盾。从欧洲殖民者的角度看，“奥鲁诺克”这个名字是野蛮的、卑贱的，而“凯撒”则是文明的、高贵的，而他们之所以不吝将那位战无不胜的罗马皇帝的姓氏赐予这个黑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这个非洲王子转化为自己的奴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奥鲁诺克身上有着某种凯撒式的高

贵性,因此“奥鲁诺克-凯撒”这个名字,就成为一个反映了欧洲殖民者对被征服民族的复杂情感的症候性符号。换言之,为了消解被殖民者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认同意识,殖民者必须在被征服者的名字上刻下欧洲的印记。但吊诡的是,这个欧洲的印记本身又成为被征服民族之高贵性的一种表征。

不难看出,在上述命名行为中(正如笛福笔下的鲁滨孙对星期五的命名那样),欧洲帝国对非洲和美洲的征服既是物质性的,又是话语性的。反过来,被殖民者的反抗,也就在物质和符号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从奥鲁诺克的角度看,在他拥有“奥鲁诺克”这个名字时,他还是一个高贵的非洲王子;而当他被唤为“凯撒”时,他已经成了欧洲人的奴隶。为了表明和恢复他的文化身份,他必须首先在话语层面上恢复他的本名。这里,帝国的叙事内部隐含了一个反帝国的话语。正如约瑟夫·M.奥梯斯(Joseph M. Ortiz)指出的,文本中交替出现的不同名字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子与奴隶之间关系的一条线索。奥梯斯特别注意到,小说在描述奥鲁诺克-凯撒与伊梦茵达-克莱明尼重逢的细节中,名字是遵循下列顺序重复出现的:凯撒、伊梦茵达、奥鲁诺克、奥鲁诺克、克莱明妮、凯撒;一头一尾两个“凯撒”像赫勒克勒斯之柱那样凸现出来,正如帝国主义的话语包围了小说的结构,给叙事提供了一个框架。而隐藏在这个话语背后的,是通过奥鲁诺克的非洲名字两次重现而提供的完整的、反-帝国的叙事。^{[4](119)}

种族身份与阶级身份的交混、王者血统和奴隶地位的冲突,使奥鲁诺克成为一个既文明又野蛮,既高贵又卑贱,既被理想化又被妖魔化的欧洲的“他者”。这种矛盾的身份困境在他的情人伊梦茵达怀孕后变得更加不可调和。正如奥梯斯指出的,“伊梦茵达的怀孕使她成为奥鲁诺克和不列颠帝国两者宣称其权威的场所。正是在这个场所中——孕育了他的未出生的孩子的子宫——奥鲁诺克发现了最令他不安的他自己的形象已经被帝国主义污染了”。^{[4](126)}奥鲁诺克试图让他的后代成为一个自由人,而帝国则试图让他的后代成为奴隶,从而永远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奥鲁诺克从发动奴隶起义到最后杀死自己

的怀孕的妻子等一系列举动就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成为一种仪式化的表演。他想通过这个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是,“不自由,毋宁死”,宁可自己没有后代,也不愿让自己的后代成为奴隶。这也正是奥鲁诺克这个“高贵的野蛮人”,以野性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高贵性的一种方式。但另一方面,奥鲁诺克残忍地杀死自己情人的举动又悖论性地证明了非洲人身上存在的野性以及相对于欧洲人的低劣性。正如艾伯特·J.里韦罗(A. J. Rivero)指出的,迄今为止一直以其文明的举止备受赞扬,最后却沦为杀死自己妻子的“丛林恶魔”的这个[转变]过程,类似于本土的印第安人首先被人性化地比作亚当、夏娃,然后又被比作丧失人性的恶魔。奥鲁诺克就这样变形为一个处在文明与野蛮间的阈限人物。^{[7](443)}

在论及欧洲殖民者对非欧洲(主要是非洲、美洲和澳洲)人的态度时,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an Greenblatt)曾利用“他者”(other)和“兄弟”(brother)这两个单词拼写和读音之间的相似性,发明了一个双关语。他指出,在欧洲殖民者眼中,这些他者(other)通常缺乏人性,只有通过欧洲人的恩赐,他们才能成为兄弟(brother),而“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熟悉化和陌生化,兄弟化和他者化的过程,在《奥鲁诺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7](448)}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奥鲁诺克》中,他者化和兄弟化的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回环式的。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奥鲁诺克的性格经历了一个从欧洲的“他者”(other)变为“兄弟”(brother),之后再回复其“他者性”(otherness),被欧洲殖民者处以极刑——“肢解”(dismember)的过程。通过这种肢解,殖民者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这个“他者”,之后,叙述者通过自己个人化的追忆(remember),在文本中重构了这个在现实中被毁灭的“他者”形象,以纪念自己在异国他乡度过的青春岁月和刻骨铭心的异族之恋。在笔者看来,作家将两个高贵者的名字合在同一个“他者”身上,表明她力图调和白人与黑人、种族与阶级、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尽管这种调和最后以主人公的被肢解而告终。

三、“新异”的美学与凝视的权力

作为第一部英国旅行小说,贝恩不仅以罗曼

司模式塑造了奥鲁诺克这位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文学形象”，而且还通过一系列民族志式的生动描述，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交往中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互相转化、互为对象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场景设置在英属殖民地苏里南，按照艾米莉·霍奇森·安德森(E. H. Anderson)的说法，作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具有悖论性的、既旧又新的场景，对于印第安原住民来说，它是旧的，而对于殖民者和冒险家来说，它又是新的，定居点和殖民者同时成为凝视的来源和对象。苏里南的印第安土著和动植物在外国观察者的眼中是“罕见的”和“奇怪的”，反过来，印第安土著也以惊讶和奇怪的态度打量着他们的英国来访者。^{[2](1)}于是，出现了近代旅行文学中特有的一种“惊奇”和“新异”的美学。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在论及近代欧洲旅行文学时，提出以“好奇”(curiosity)或“惊异”(wonder)来概括其美学思想传统。据福舍勒(P. Fussell)考证，curiosity一词出现于16世纪末。^{[9](25)}尼格尔·里斯克(Nigel Leask)认为，17-18世纪通常从正面的意义使用“好奇”一词，意为“小心地”、精确地展开经验性的调查研究(实际上从词源学上说，好奇一词源出拉丁语cura,意为“关注”[attention])。^{[10](28)}帕拉姆·K. 纳亚尔(Pramod K. Nayar)在论及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美学”时指出，“好奇(curious)这个词在所有的游记中频频出现，意味着某种态度。一个好奇的人兴趣广泛，为求知而求知，对于来自感官的经验始终持有一种怀疑。……好奇的和观察的旅行者追求新的知识领域，记录所见所闻，将其纳入一定的叙事框架中。”^{[11](19)}格林布拉特曾将惊奇的经验视为“欧洲对新世界的反应的主要特征，在绝对差异的情况下决定性的智力和情感经验”。^{[12](22)}

与“好奇性”相关的另一个词汇是“新异”(novel)，该词在《奥鲁诺克》中频频出现，词义基本与“好奇”相同。小说开头不久，贝恩就借叙述者之口强调指出，“没有新异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好奇心”。^{[6](1-2)}可见，在她心目中，新异是激发好奇心的必要条件。同时我们知道，在

贝恩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年代里，“novel”一词也指当时新出现而尚未定型的一种介于罗曼司与民族志之间，集“新异性”与“传奇性”于一体的文体，即小说。这样，一种新异的美学观与一种新兴的文体就纠结在一起了。

《奥鲁诺克》正是体现这种“惊奇-新异”美学-文体的一个典型范例，小说花费在地理细节和美洲土著的诸多笔墨，不仅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某种癖好，也迎合了当时的读者层的猎奇和求异心态。叙述者观察并纪录了跨文化交往过程中，因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凝视与被凝视关系的转换而形成的“新异”的美学体验。

小说一开头就花了整整3页篇幅写了女叙述者与苏里南人相遇、做买卖的情景，给读者提供了一连串欧洲及英国读者闻所未闻的动物、植物和奇珍异宝的名字，包括：一种“像小猫那样大，形状类似狮子的小兽”Cousherie，“像英国的橡树那么大的大树构成”的森林，“像我的拳头那么大的苍蝇”，“巨大的蟒蛇皮”，还有“数以千计的令人赞叹和惊讶的不同形态、形状和色彩的鸟类和兽类”。在这个原始的“伊甸园”背景中，叙述者突出了印第安土著的无知、质朴和天真，她强调指出，“这些人给我展示了人类在不知犯罪之前、一种天真的初始状态的绝对理想：最清晰和明显的就是，质朴的大自然是最无恶意的、最仁慈的和最道德的女主人(Mistress)。只要她允许的，就是对世界的最好的教导，比人类发明的所有教导都更加美好：这里，宗教只会摧毁他们因无知而享有的安宁；法律只会教会他们犯罪，幸好他们现在还对此一无所知”。^{[6](3)}

上述贝恩的民族志式描述，无疑“弥漫着她对一个失落的世界的怀旧的欲望”，^{[7](447)}但显然作者是带着欧洲文明人的优越感和惊异感来观察和描述印第安土著的生存状态的。小说后半部分讲到，女叙述者和她的伙伴在奥鲁诺克的带领下，深入莽林、溯流而上，进入新大陆腹地，前去探访一座印第安土著小镇。出于好奇心，她突发奇想，要求奥鲁诺克和另一位懂当地土语的渔夫先不要进去，藏匿在丛林中，让她们三人独自前往，观察土著看到“白人”的反应。于是，这次拜访就成为一个集发现、惊奇和新异于一身，类似现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的“田野考察”

(field work):

我们进了镇子,它沿河而建。在房子或茅屋不远处,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跳舞,还有人在河里取水。他们一发现我们,就大声喊叫起来,开始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害怕,以为他们要杀了我们,但其实这只是奇怪和吃惊而已。他们全都赤身裸体,而我们则穿着衣服……我自己剪了个短发,戴了一项太妃帽(Taffaty),头上装饰着黑色的羽毛;我弟弟则穿了一身正规套装,缀有银环和银扣,还缠着许多绿色的丝带,这就是不断使他们惊奇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等我们过去,我们大着胆子接近了他们,然后把双手伸给他们,他们握了我们的手,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呼唤更多的同伴前来。更多的人蜂涌而来,还喊着tepeeme,把他们的头发握在手中,向那些听到喊声而涌来的人们散开,好像在说(的确是这个意思)“数不清的奇迹”,比他们头上的头发还多,都数不过来了。^{[6](55)}

这里,旅行者-殖民者-凝视者(traveler-colonialist-gazer)三位一体,通过对土著的裸体的凝视,表述了对“我们”与“他们”,即文明与野蛮的看法。“他们”是裸体的,因而是野蛮的,“我们”是着装的,因而是文明的。“他们”是被旅行者(travelee),“我们”是旅行者(traveler);“他们”是被凝视者,“我们”是凝视者。女叙述者的文化优越感在此暴露无遗。

接着我们看到,随着文化交往的深入,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转换了,白人成了被凝视的对象。“他们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了,先是从头到脚**盯着**我们,然后**触摸**我们;他们把手放在我们的脸上,**摸摸**我们的前胸和手臂,**提起**一个人的裙子,然后好奇地看另一个的;他们**赞叹**我们送给他们的鞋子、袜子,更赞赏吊袜带;他们把银带子系在脚上;因为他们非常尊敬闪闪发光的東西;最后,我们忍受了他们随心所欲地打量我们,我们觉得他们从来没有羡慕过我们”^{[6](5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虽然主体和对象的位置互换了,但文化交往的性质还是没有变。叙述者有意设置的“相遇场景”(contact scene):裸体的土著对着

装的叙述者及其同伴的赞叹、触摸和打量,反映了自然对文明的膜拜和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在这个被他者凝视、触摸和赞叹的过程中,主体意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叙述者。当藏匿在丛林中的奥鲁诺克和本土“导游”看到叙述者与土著接触的场景后,生怕出事,离开丛林、进入镇子时,土著们开始向奥鲁诺克这位懂印第安语、并与他们有过交往的黑人提出了一连串有趣的问题。

于是,[他们]走近他[奥鲁诺克],有些人向他伸出了双手,并喊道 Amora Tiguamy,意思就是,“你好吗,朋友”;所有的人喧闹起来,开始急促而不清楚地问他,**我们**是否有感觉和智慧?**我们**是否会谈论生命和战争?**我们**是否会打猎,游泳,是否会做他们做的成千上万的事情?他回答他们,**我们会的**^{[6](56)}(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这个场景的描述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称代词的用法。从语法上讲,既然整篇文字均是从“他们”即土著的视角展开的,那么被“他们”提到的“我们”就应该用第三人称复数来表述,但在这段文字中,凡是应该用“他们”的地方都用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现代的读者——看到的是女性叙述者的叙事焦虑,她不希望自己成为印第安土著的“他者”,成为被后者议论、谈论、触摸、凝视的对象,一直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优势视野”。但文化交往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单边的,而总是双向的、互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试图通过修辞上的精心安排,来弥补这个因文化接触和交往而带来的主体地位的失落感,但也正是这种叙事-修辞上的精心安排,不经意中暴露出叙述者的内心焦虑。

按照艾伯特·J.里韦罗的说法,上述场景远不只是预演了某种帝国-殖民叙事的普遍模式和成规,它也投射出贝恩这位女性作家的个人欲望。“在她的叙述中,作家第一次绘制了自己的图像,用文字在苏里南建构起自己的存在,一个可以被赞赏、被欲求、着装的和不着装的、被触摸的,可触摸的,可感知的、有吸引力的、年轻的,有着几乎像‘土著’的头饰一样的时髦的短发、有胸脯、有臂膀、有双脚,能够被感知和被崇拜的身体。因此,在这个殖民小说的有力的空

白的空间中,贝恩将自己建立为我们的性关注的中心,不仅明显地提醒我们,这个故事是一个女性写的,而且又在她的文本中重新创造了这个她一度曾经是、可欲的年轻女子。”^{[7] (443)}

四、结语

作为产生于17世纪的第一部英国旅行小说,《奥鲁诺克》风格和文体是杂糅的,叙事框架和意识形态是断裂的,贝恩在罗曼司叙事模式与民族志的描述模式之间徘徊不定。她在赞美“野蛮人”的高贵性的同时,批评了其身上残存的野性;在鼓吹欧洲“文明”先进性的同时,揭露了其贪婪的商业性和动物性掠夺;在表现“爱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不断加入具有作家特权的“自我主义”(egotism)和媚俗性、愉悦性描述。所有这些都使《奥鲁诺克》成为一个内容庞杂、形式不定的作品,但也正是这些与“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语)相对应的特征使得它成为一个症候式文本,反映了现代性启动之初帝国的空间是如何进入文本叙事框架的;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性、主人与奴隶的观念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建构起来的;欧洲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与个人欲望相结合,并通过个性化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贝恩也许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作家,但肯定是最富原创力、最值得不断重读和重估的作家之一。她根据自己的旅行经历所创作的文本,及其所提出的一些前瞻性思想,在我们这个跨文化交往时代里,无疑有着持续研究的价值

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ANONYMITY. The royal slave[EB/OL]. (2008-11-07) [2009-07-01] <http://cid-435412e7696d7d4a.spaces.live.com/Blog/cns!435412E7696D7D4A!149.trac>.
- [2] ANDERSON E H. Novelty in Novels: A Look at What's New in Aphra Behn's Oronoko[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07, 39 (1): 1-16.
- [3]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 邵迎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 ORTIZ J M. Arms and the woman: narrative, imperialism, and virgilian memoria in Aphra Behn's Oronoko[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02, 34 (2): 119-129.
- [5] TURNER V.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6] BEHN A. Oronoko: or the royal slave, a true history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rton library edition by Lore Metzger[M].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73.
- [7] RIVERO A J. aphra behn's oronoko and the "blank spaces" of colonial fictions[J].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99, 39 (3): 443-454.
- [8] 亚力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 姜志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9] FUSSELL P. 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 with introduc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87.
- [10] LEASK N. Curios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vel writing, 1770-1840: from an antique land[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NAYAR P K. English writing and india, 1600-1920: colonizing aesthe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12] BOHLS E A, DUNCAN I. Oxford world's classics, travel writing, 1700-183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5.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Oronoko, the First English Travel Novel

ZHANG De-ming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Oronoko*, the first travel novel in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Aphra Behn creates a 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first noble savage in English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histo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European romance and ethnography. Involving such prospective issues as the western modernity folding,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pace exp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nations, as well as the views on civilization/savage, master/slave, self/other, and exotic aesthetics building, the novel is well worth sustained study in the current era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nglish travel literature; Aphra Behn; Oronoko; cultural study

(责任编辑 王抒)